

廖省:林越

《央视新闻》4月报道,“2021‘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候选活动在北京揭晓。经月余的征集和筛选,有9个汉字入围,分别是:合、通、同、互、韧、驰、长、济、安;从不同层面概括“一带一路”过去一年在文化交流、遗产保护、经济合作方面的成果和特点。

中国公关协会副会长王大平说:“我个人印象比较深的是‘坚韧’的‘韧’,2020年疫情发生以来,‘一带一路’各方面建设都是持续稳健地向前推进,也是这种韧劲、这种奋发向上、这种合作精神,都是得到充分体现。”当然,其他8个字也获得多人支持。

2021“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5月15日在“孔孟之乡”的山东济宁市揭幕,“互”字作为最能体现2021年“一带一路”精神内涵的汉字拔得头筹,成为年度汉字。

汉字的“互”,本意指一

2021年“互利稳扎”的亚洲华人

种绞绳子的工具,后引申为彼此、相互。这突出了“一带一路”各国之间的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是对“一带一路”精神的高度提炼和美好祝愿,也表达了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世界人民更需要相互支持,相互配合。

中国公关协会会长郭卫民说道,古丝绸之路绵延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包容、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年度汉字发布活动,是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不断提升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

《亚洲周刊》第50期刊文“2021亚洲周刊年度汉字”称:“亚洲周刊选出2021年度汉字是‘稳’,展示全球华人社会告别政治动乱与严峻疫情,拥抱来之不易的稳定,稳扎稳打,稳中求胜,

追求内心世界的‘稳’,重视制度创新,不惧疫情与政情的挑战。”

汉字‘稳’,也彰显全球华人社会的自我期许,“从中国大陆到香港,从台北到新加坡,都有一个稳定的局面。在安和乐利中稳扎稳打,追求内心世界的‘稳’。”

稳定该从中国抗疫成功说起,14亿人口,染疫死亡人数不到5千;而美国的疫情死亡人数已接近80万,欧洲更高达150万人死亡;显示中国防疫“清零”政策的成功。香港疫情死亡200多人,台湾则死亡848人,澳门更是“零死亡”。新加坡虽一度师法西方集体免疫导致确诊人数飙升,但仅771人死亡。两岸四地与狮城都展现防疫高效的成绩。

抗疫成功,让亚洲华人更有信心,慎防西方社会拒戴口罩、反对疫苗等反智、反科学的歪风传入本区域,

确保民众权益,而非被民粹力量绑架。亚洲华人发现困中求稳,才是突破之道,才能在负面的氛围与情绪中,以稳求胜,重视制度创新,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媒体报道,从11月9日起,2021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活动正式开启,主办方邀请两岸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36位知名人士,推荐他们心中最能代表2021年的年度汉字。海峡两岸汉字暨年度汉字评选活动已经成为全球七大汉字评选活动之一,其参与度与影响力跃居前三名,被誉为“海峡两岸参与民众最多、影响最广泛的文化交流活动之一”。

台湾《旺报》前副社长刁明芳表示,受到疫情和两岸关系冷淡影响,台湾各界人士推荐的汉字略显消极,如“困”“退”“迷”“忧”“危”“卡”“乏”等,但也有些字展

现人们的期许,如“盼”,寄托了对早日消除疫情影响、提振经济和改善两岸关系的愿望。

12月1日,经过投票选出初选的10个汉字,将于12月8日进入票选阶段。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结果9日在台北正式揭晓,“难”字以最高票当选。“难”字从困、迷、变、复、缓、拼、忧、危、忙等36个候选汉字中脱颖而出,以113多万票获选为“两岸年度汉字”。据悉,今年活动的总投票数逾1608万人次,创下历年参与人数的新高。

今年是海峡两岸汉字节开办的第八个年头。前年当选的“困”,去年当选的“闷”,加上今年的“难”,道出了台湾民众的苦楚,更隐喻着破解困局的方向——只要两岸民心向善,沟通的门是敞开的,没有什么“困闷”摆脱不了的,没有什么

“难关”跨越不了的。厦门市海沧区文联主席陈意安在致辞中说,汉字文化博大精深,两岸同胞血液于水,希望两岸各界进一步紧密携手,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两岸同胞契合尽一份力。《海西晨报》社长陈炜明表示:“我们感受到人类与疾病抗争过程的艰难。两岸是患难与共、血浓于水的一家人,面对艰难,大家要一起扛,期待明天会更好。”

台湾中华书学会会长张炳煌表示,“难”字选得非常切题,“希望我们可以克服困难,拥有光明未来。”台湾两岸商务发展基金会董事长张平沼回顾自己参与两岸交流的历程说:“一路走来,有诸多困难,但也有不少契机,期待两岸交流能稳步前行。”

作为“用简识繁”的海外华人,窃认为繁体字的“穩”要比“禾”旁用“急”的“穩”字更能体现华人对局势的冀望。再回首,2021年,亚洲华人“互助穩扎不畏难”!

雅加达:游子

(九)进了印尼文夜校及华人融入当地活动

1965年中,自毕业离开母校后,我心中总感到莫名的惆怅、孤寂;多么留恋那刚刚告别的留学生活,能与同学们一起学习、一起打球、游戏,彼此嘻嘻哈哈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如今大家各散西东、劳燕分飞,往日的每一幕只能在梦中追忆。

不久传来了在中华小学第一校已开办了印尼语文补习夜校的好消息,次日我迫不及待的去报了名。没想到来报名的学生那么踊跃,全是华人,有与我一般年纪的,也有年青人、中年人,都是一些工人、农民、店员、小贩。夜校的课程分为初级、中级与高级,每星期上三天课,从晚上七时到九时,我就选上中级的课程。幸好进了这间夜校后很快就结识了几位同龄小伙子,渐渐填补了离校后心中的惆怅与空虚。其中一个叫黄小田的,在菜巴刹里卖咸菜,经常晚上会聚在我家中谈天说地,和我最要好。

只是那时我已在大姐夫店里帮忙,所以每晚还要回那郊外的小店去睡。

1965年8月17日,适逢印尼独立20周年的庆祝活动,山口洋的华侨社团、华侨学校学生都参与了那次庆祝游行。华侨社团的青年们扛着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的巨

幅画像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头。当时的轰动场面可说是史无前例的,也是西加华人参与纪念印尼国庆“绝无仅有”的一次罕见场面,以后的几十年里再也没有那种机会出现了。

转眼新中国成立16周年的日子也到了。这一年山口洋的多个华侨团体联合举办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包括在中华小学第三校校园广场中搭建起舞台,准备于9月30日晚向市民献演文娱节目。我感到自豪的是两位哥哥和四姐都有参加演出,当晚就约了好友小田去观看。节目真的不错,其中有舞蹈《采茶扑蝶》、马都拉舞《船歌》、乐器演奏、合唱、话剧……那出越南人民抗美的话剧还深植在我们年少的脑海里呢。

直至十时多才散场。回家路上,我心里很激动,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参加哥哥的“中华青年会”,参加他们的各种文娱活动。

1965年10月1日,旭日东升,灿烂的阳光将山口洋这个小镇装扮得无限明媚绚丽,三五成群的华校学生,穿上整洁的校服,兴高采烈地走进校园参加中国成立第16周年纪念仪式——天真活泼的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升起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国旗,唱着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国歌。但谁都没想到,就在山口洋华人子弟沉浸在欢乐的节日气氛中,雅加达一夜之间却发生

光阴荏苒 岁月留痕 ——身居故乡25载回忆录

了血腥的军人政变!

(十)山雨欲来风满楼 排华声浪一浪比一浪高

我读不上三个月的夜校突然停办了,从雅加达又传来了一些让大家感到惊慌不安的消息,人们心头蒙上可怕的阴影。

几天后,我正替姐夫在镇里办货,却遇上一群人在街上游行还高喊口号:“卡扬欧朗支那!欧朗支那滚回支那去……”

商店的老板们看到不对劲,赶忙叫伙计快关店,一时整条街慌乱起来……那一群流氓气焰嚣张,不单大喊大叫,见到写着中文的店号、招牌还强拆下来砸碎、涂鸦!我当时也敢吓得藏在老板的店内不敢回去。

1966年4月22日,那是我一生中无法忘怀的日子:我的邻居小马气急败坏的跑回家。

“怎么了?小马,这么早就跑回来,没上课吗?”小马的母亲好奇地问道。

“妈!我们不能读书了!”小马气得直跺脚:“刚才上课时,突然来了一群暴徒,蛮横无理的要赶我们出教室,说学校被政府封闭了!校长只好叫我们先回家。”

“怎么有这么野蛮的人!”小马的妈直摇头:“他

们吓吓人吧?别担心,也许再过些日子就没事吧!”

“简直是一群强盗!”邻居们听了都气愤的破口大骂。

很快的坏消息陆续传来,镇里的华校一间一间的被政府派来的人封闭了,学校里有些来不及搬走的物件还让那些流氓顺手牵羊的拿走,母校南中校内化验室的各种仪器、音乐室里的钢琴都被抢劫一空。虽然当时我已离校近一年了,但想到老师们失业,学生们失学,心中无比沉重与悲愤!

一天,二哥神色凝重地对我说:“县政府已下达了命令,要将我们三发县所有华侨团体工委理事集中到坤甸去,我和你三哥都榜上有名,这一去命运如何,凶多吉少;这事千万别先告诉爸妈,免得他们伤心,记住啊!”

二哥的话如晴天霹雳,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又是那么千真万确!

要来的日子终于来了,那天是1966年12月,两位兄长和其他全县的工委理事第一批在军人的押送下告别了小镇,我们全家与其他受害家属一样,都沉浸于悲痛中……

紧接着12月20日上午,第二批华侨社团理事又被

集中在山口洋班查西拉大厦县政厅前,将分乘几辆大客车被载到坤甸去。

他们中有我们的老师、也有哥哥们的朋友,以及这小镇里有名望的人士,所以有许多华侨都不约而同前来送行。但见送行的人群挤满了河两岸的大路和桥上,人头攒动,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悲伤与愤慨。临行前因为有位理事登上车头想向送行的人群说声告别,但立即遭到看守军人的阻止,并被强行拖了下来……这一暴行立即激起送行华侨的愤慨,怒吼声从四面八方向这群军人压了过去,气氛顿时显得紧张,军人们狠狈的朝天开了一排枪,才把愤怒的群众驱散。这时华社理事们乘坐的客车也被令马上出发。车开了,他们都探出车窗向走散的人群挥手告别,向着那扑朔迷离、生死未卜的路上驶去。

此时,我只感觉前程一片迷茫……

过了好几天,从坤甸传来了消息,说被集中到坤甸的工委理事们已被安置在坤甸的郑氏、杨氏等华人姓氏会馆里,并说军方看管得也不严,这才

叫我们松了口气。但约半年后,万万没想到到被“放逐”到坤甸的二哥突然跑回家来。

“是请几天假回来的,大家都这样!”二哥看到我及家人满脸惊奇后解释道。

“真不可思议!”我苦笑说:“日常生活呢?”

“没问题!坤甸的同胞都很热心,经常会给我们送来米粮、蔬菜、猪肉等食品。”二哥道:“那边的官方也没严格看管我们,我们说要回家看望家小,都得到批准。”

就这么又过了几个月,哥哥们也像其他同伴一样,请了几回“假”回家后就不再回到回去了。也许是当时坤甸市政府不配合,三发县军部放逐县里华人团体工委理事的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未完待续)



这种离间的态度四处蔓延。在美术评选活动中,但凡带有中国特色的绘画作品都无法入选政府主办的大型艺术活动。中国画被视为“国民公敌”,是带有中国共产主义势力和企图的。新秩序时期只有在一次政府活动中展出了中国画,那就是1984年雅加达艺术委员会(Dewan Kesenian Jakarta)主办的绘画作品双年展(Biennale VI Seni Lukis),展示的作品是华人画家李俊才的水彩画。此后,再无中国风作品受过如此青睐。

雅加达文化馆曾多次举办华人画家中国画作品展,包括庞国喜(Phang Guoxi)、曹毅周(Chou I-Chow)和花飞公子(Play Boy)画廊的系列作品。还有一所酒店举办了肖昌的个人展,但缺乏宣传。据庞国喜称,很多媒体不敢报道任何有中国元素的艺术活动,怕与政治以及共产主义扯上关系。

这种打压甚至蔓延到坟场墓地。比如,1990年万隆地方政府曾下令清除华人墓碑上雕刻的碑文,所幸的是,这个过分的指令最终被撤销了。(Suryadinata, 2002)

华人美术家们没有机会登上广阔自由的舞台,也看不到通过攀登能抵达主流美术家平台的希望。由于不被接纳,这种“中国特色”的艺术探索可以说经历了退步,华人美术家开始寻找其他机会。为了生存,他们参照市场爆款来创造作品。然而,尽管这些作品有非常独特的视觉效果,但是仍被归类为市场化商品,并不断遭受印尼艺术界的侮辱。

1998年之前,华人美术家们饱受歧视之苦。1998年以后,这种高压政治不复存在,华人艺术得以重返舞台。数以百计的华人美术家——通常活跃在绘画艺术领域,在发表作品和举办展览之间忙得不亦乐乎。慢慢地,华人美术重现潜能,并巩固其独特的存在地位。

总体而言,华人美术风格可以通过以下特征分为三类。第一,保留中国传统绘画样式和风格;第二,将中国美术风格与西方或印尼美术等其他风格融为一体;第三,丝毫看不出其中中国性。

肖昌和庞国喜是谨遵中国传统绘画风格的华人画家代表。他们坚信,中国画的

华人美术的社会层面(6)

阿古斯·德尔玛万(AGUS DERMAWAN T)



独特风格才是华人绘画作品的标志。这些作品通常为纸上水彩,使用湿刷或干刷绘成,笔刷成山形,唤作“毛笔”。画作的一侧用于题词、记叙心得、描述物象,或作诗以补充说明绘画。中国画家讲究的一个原则就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李曼峰是一位擅长融合中西方绘画元素的画家。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隐约可见印尼绘画元素的影子。他凭

借一支笔,不论是钢笔、铅笔或是画笔,将画作描绘得栩栩如生。李曼峰涉猎的类型很多,包括素描、蜡笔画、水彩画和油画。他在画布和硬纸板上创作的水彩画,颇具传统中国画荡气回肠的特征,特有的留白代表了大自然的广阔无边。另外,他的人物画或静物类画作则运用西方绘画的写实手法。他经常运用中西结合的艺术风格,来表现印尼主题,如水果

小贩、人力车夫、达雅克舞(Tari Dayak)以及峇厘岛人民的生活。

另一位画家贝尼·斯迪亚万(Benny Setiawan)的作品虽立足于西方艺术视角,但是他也深谙中国艺术的规则和哲学。他还在西式的视觉表达中插入峇迪艺术元素。贝尼是一位长期接受峇迪艺术影响的华人画家,因而在视觉上很难发现他的中国艺术风格。人们很难通过作品辨认出他的华人身份,除非亲眼见到这位原名为张清泉(Thio-Tjeng Tjwan)的艺术家,眼睛细长,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与贝尼(Benny)相似的还有画家达唐·克里斯丹多(Dadang Christanto)。他创作了许多现代主义流派的画作,毫无中国元素的痕迹。不进入装置艺术领域时,他也秉持同样的态度。虽然克里斯丹多的作品难以归类为中式还是西式,但常常取材自华人在印尼的悲惨故事,这或许是因为他的父亲是1965年930事件后军事暴力的受害者。他曾创作了一个名为《红色暴雨》的装置艺术作品。作品中,数千条红线悬挂于天花板,线的尽头则

弯弯曲曲地固定在地板上。(详情参考本书《七十年代的华人艺术家》)。

从上述三个故事中可见,华人艺术家的确能够借助不同风格样式艺术形式,为印尼美术添砖加瓦。

从那些坚持多元化发展的发达国家所给出的众多例子便可得知,“外来移民”,如华人,他们的艺术成果能大大丰富一个国家的文化。美国旧金山(San Francisco)艺术机构多次将水彩画家曾景文(Dong Kingman)评为“年度人物”。此外,美国还十分敬重夏阳(Yan Hsia)、高夏华(Gao Xia-Hua)这些照相写实主义画家,并对外在多个国家把他们树立为美国艺术的代表。从四十年前开始,法国对“出逃”的中国画家关照有加,不仅提供人文关怀,还替他们宣传曝光,以增加影响力。

改革时期,华人艺术重回正轨。华人艺术在社会上不再充斥着哀怨气氛,也不再在自豪之中夹杂着无法登上历史大雅之堂的遗憾和可惜。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